

野村浩一访谈录（2007年4月21日 于东京大学驹场校区）

纪晓晶译

野村浩一（立教大学名誉教授）

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教授）

川尻文彦（帝塚山学院大学副教授）

大泽肇（东京大学研究生）

吉见崇（东京大学研究生）

村田雄二郎：

我们从您升入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专业开始谈可以吗？

野村浩一：

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成长经历吧。我是1930年（昭和5年）出生的，次年1931年就是“满洲事变”发生的那一年。我上小学2年级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是在我上小学6年级时爆发的。也就是说，我是在昭和初期的战争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我曾经是个极其普通的军国少年。

中学4年级时，战争结束了。从这时起，我自己的战后人生才正式开始。次年47年时，我进入了旧制的“三高”学习。三高充满了自由的风气和传统，我觉得自己的精神史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这一年正好是旧制的最后一年。因为学制一共3年，所以我于50年毕业，并在同一年踏入了东京大学的校门。

我进入的是法学部（政治学专业），所以从没有想过要当一名研究者。可能上文学系的人这样的想法比较强烈吧。我进入法学部时，最初的打算就是将来能普普通通地找个工作。

回过头来再看看历史年表，我进入东大的1950年的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51年签订《旧金山和约》，52年发生了“五一事件”，之后丸山升先生经受了很大磨难。虽说我跟党派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社会主义将来必会实现。我认为很多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有这样的感觉，虽然这种想法有些流于学生气。

“五一事件”的时候我也冲到了宫城前面，可是我在千钧一发之刻逃脱了，但是我和丸山先生不同，我没有担任率先指挥者，（笑）所以逃脱后就没有其他后续的事了。尽管如此，这个事件仍然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我也一直关注着现场情况。可以说当时就是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

我在东大就学3年，于53年3月毕业。大约是在上大学3年级时，我萌生了步入研究之路的想法。这完全是因为受到丸山真男老师的影响。并不是我个人懂多少研究，一是通过阅读丸山先生的非常有名的“超国家主义理论和心理”等文章，另一个则是徂徕学的研究。我在《国家学会杂志》上读到丸山老师对德川思想史的研究——“自然与作为”之后，受到了极大冲击。我一心想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从事这方面的学习。

于是我向丸山老师申请想继续留在研究室学习，当然并没有马上得到批准。我三年级时

参加过丸山老师的讨论课，所以老师对我说“把你写过的东西提交上来”。我当时打算研究日本的思想史，所以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江户时代的石田梅岩的石门心学，大概有 50 页左右吧。最后老师对我说：“研究政治思想史是相当辛苦的，将来就业也完全没有保障。你如果有研究意愿那就试试看吧。”

进入研究室时，我本打算研究日本的政治思想史，完全是按此作的计划，所以我完全没有想过要研究中国。最初和老师商量时，老师说：“研究日本思想史的人很多，而我的课程名称虽然叫东洋政治思想史，但并没有人研究中国的部分。我完全没有强迫你的意思，你试试研究一下如何？”

我回答说请容我稍微考虑一下。

所谓的中国研究到底是做什么的呢，那时我并没有概念。虽然战后东洋史的论文层出不穷，也曾有一本薄薄的书叫《史学杂志》文献目录，但因为战争结束刚 5、6 年光景，所以 45 年以后发表的论文、著作的数量并没有那么庞大。我当时想作为切入点阅读这些资料就足够了，但我没有通读全部，只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回想一下，战后的东洋史研究和现代中国初期的诸多论文之中，很多文章都对我影响很深，我觉得这些文章一般都是在比较大的范围内经过深思熟虑完成的。专攻日本史的人很多，题目也比较细化。所以，我感觉研究日本史好像就是研究小题目，而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史就象用大砍刀一刀一刀砍一样。当然，这实际上是相当片面的认识方法。不管怎样，这是因为对中国抱有极大兴趣而产生的想法。

当时，我是一名特别进修生。这个制度是在战争中产生的，前期 3 年、后期 2 年。我当时是特别进修生前期。用现在的话说，应该相当于硕士研究生、博士或者助教这一类吧。

当时我所做的工作就是，从与研究东洋史、中文和中国哲学的人完全不同的立脚点出发，以学习语学为首，而且必须从完全没有基础的科目学起。此外，还要在 3 年以内完成毕业论文。

当时，丸山老师对我说，虽然说广泛阅读史料是极其重要的，但如果没有发现问题的眼光则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夸张点儿讲，先生指示我第一年必须把方法论和理论学习搞得扎扎实实，还追加说让我尽可能对中国的古典先进行常识性的掌握，同时还必须要阅读马克思·韦伯的著作。所以，我在第一年以《儒教和道教》、《经济与社会》的德文原著为中心进行了学习。

但是，我不懂中国文字，而且对中国可以说一无所知，因此我十分不安。我时常会怀疑自己是否正确地解读了资料。我曾在旧制高中就学所以学过一些汉文，本着对汉文的热爱所以还能硬着头皮勉强继续研究。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不懂汉语。我至今仍能回忆起那种遍布周身的强烈的焦躁感。

另外，我当时本打算研究宋学等中世纪的学问，我想从事一种可以运用徂徕学的分析方法、并具有十分明确的概念史性质的研究。但是，对于我的想法，老师表示这是在本科阶段做过的研究，他建议我说“还是研究近代好，研究近代更加必要”。但是我认为，单单为了这个原因就从近代开始入手是不妥当的，我打算先从“由近世到近代”这样一个角度入手，于

是第一篇论文我选取了清朝题材。

最终，我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大致定为“从清末到近代”，并以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设定问题。经过第二年、第三年的刻苦学习后，我完成了论文的初稿。听说这次采访项目是以“学问系统”为主题的，以我的研究环境而言可以说我正是从这点出发的。

村田雄二郎：

您进入大学时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有没有哪些同时期的革命活动加深了您对中国的兴趣，或者在东京大学学习的过程中您读过的哪些书或上过的哪些课程增加了您对中国的关心度呢？

野村浩一：

在学生时代，我对当时中国的一般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至少对我来说诸如“New China”、“新中国”这样的概念在我脑海中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我像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受到了爱德华·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中国》的极大影响。回过头想这是最值得深思之处。当然，其背后也存在着中国革命这一实际问题。

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后发生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大幅度转变，这是一个大前提。我觉得连续性的问题是很重要的。此外，至少在当时，中国被人们誉为获得了重生。如此一来，弄清楚“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转变的原因成为了一种理性的、学问性的探索。另一方面，换个角度从普通人的感觉来说，日本与“蒋介石的中国”进行了战争，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了。所以，在45年后的2、3年中，日本处于所谓的“断壁残垣、黑市”时代之中，人们为了生活而竭尽全力，过了几年一看，邻国中国的领导已经从蒋介石换成了毛泽东。从一般人的感觉来看，这之中的原因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也数次被普通群众问及过这个问题。

村田雄二郎：

您选择清末的公羊学作为特别进修生时的论文题目（《清末公羊学派的形成和康有为学的历史意义》（一）（二）（三）、《国家学会杂志》71卷7号，72卷1、3号，1957、1958年）是与此有关系吗？您从思想上探求过“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过程，对清末的公羊学也是如此吗？

野村浩一：

不是的。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跟公羊学相比较，我更想追溯的是从清末开始的变法运动、变法思想的登场及其后的开展过程——也就是所谓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变革过程。

村田雄二郎：

在大学时代，您在丸山老师的课程以外接受关于中国知识的经历，还有您当时参与学生

运动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野村浩一：

我上大学本科的时候，完全没有像其他系——例如文学系的学生一样接触过中国关系之类的知识。我们法学部只有仁井田陞老师开过一门“东洋法制史”的课程。

村田雄二郎：

您跟研究东洋史的老师或学生没有过接触吗？

野村浩一：

上本科的时候原本就没有把东洋史作为研究对象，所以完全没有接触过。倒是在系里的讨论课上接触过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村田雄二郎：

发生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变之后，您是否想过必须要建立一种新的学问来代替迄今为止的汉学、支那学、东洋史呢？

野村浩一：

说句实在话，我个人从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我反倒是抱持着要研究近现代中国本身、并且要把它弄透这样一种想法。我觉得可能研究东洋史或中国哲学的学者们会有您说的那种想法吧。至于我呢，以前在法学部时没有研究环境，所以那时首要的任务是先成为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那样一来，我就可以出席每周一次的研究会了。这一时期我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当时，所长是仁井田陞先生，研究会中还有中根千枝先生、周藤吉之先生等各位第一流的老师，大家都积极地进行着学术研究。我那时拼尽全力、力图尽可能多的从那里吸收知识。

另外，还有两位法学部的学长坂野正高（都立大学后升入东京大学）、卫藤沈吉（东京大学）。这应该是与“学问系统”有关的吧（笑）。坂野学长上面还有植田捷雄学长。得知我在法学部要研究中国关系，这两位学长——特别是坂野学长对我非常地关照。他们两个人是专门研究“东洋政治外交史”的，而我的研究内容中也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方面是思想史研究。坂野学长给我介绍了很多位研究者，首先就将研究东洋史的市古宙三先生（茶水女子大学）介绍给我了。这也是一个“学问系统”吧。

此外，说不清是在特别进修生的前期还是后期，我结识了研究东洋史的柳田节子（宋代·经济史）、重田德（清代社会经济史）、小山正明（清代经济史）、小岛晋治（中国近代史）（当时大家都是助教），他们也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另一方面，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也相当积极地与我进行了联系，可能是因为坂野学长或者其他人的推荐吧。我的故乡就在京都，所以每次到休假回老家时我都去拜访小野川

秀美先生和岛田虔次先生，受到了他们很多教诲。每次拜访并没有讨论什么具体的问题，内容都是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学问上的杂谈。也许是因为从法学部毕业而研究思想史的进修生比较稀有吧，他们都对我十分热情。岛田先生还把我带到他的家里，给我引见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吉川幸次郎先生。

村田雄二郎：

当时，人文研（“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日语简称，下同）已经开始进行辛亥革命的研究了吗？人文研已经开始做关于近代中国的共同研究了吗？

野村浩一：

应该比您说的时间还要早得多。我感觉，桑原武夫先生主办的研究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和法国大革命的共同研究在当时已经非常有名了。但是，对于当时人文研内部的中国研究我并不十分了解。我只是单纯地和人文研的两位先生聊聊天而已。

村田雄二郎：

你们聊天的内容不仅是关于近代中国，而是和中国有关的所有事情吗？

野村浩一：

我只是就清末的问题请教了小野川先生和岛田先生。那时，我刚刚从小野川先生的著作和论文中得到一些提示，我的想法是稍微梳理一下历史，而关心的重点集中在历史意义及地位上。但反过来说，关于清末的思想，如果不这样进行梳理的话，也就没法超越小野川先生做过的研究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实证主义方法在别人面前有点儿抬不起头来。至于岛田先生，他的文章与其说是思想史研究不如说是在讲大道理。当然，岛田先生写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还是有极大意义的。

另外，我的“原籍”是政治学研究室，关于这一点必须多少做一下说明。我和研究政治学相关内容的人共同学习生活了3年，甚至进修生后期的两年在研究室里也一直与他们并肩而坐。在日常举行的学习会中，我一直和福田欢一（西洋政治思想史）、篠原一（欧洲政治史）、坂本义和（国际政治）、宫田光雄（西洋政治思想史）等前辈，还有田口富久治（政治学）、高岛通敏（政治学）、半泽孝磨（西洋政治思想史）等在一起学习。我们谈论的都是拉斯基、霍布斯、洛克、卢梭，或者拉斯韦尔、里斯曼等。我经常被坂本先生他们问“你是怎么认为的？”（笑）所以，以此为基础，除了坂野学长和卫藤学长这些研究中国关系的学者之外，我又结识了东文研（东方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史、人文研、中国哲学的各位研究者。

现在想想，在当时那种学风盛行的时代中，我以一种相当特殊的形式开始了研究。我是学政治学出身的，提起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坂野学长和卫藤学长研究的“东洋政治外交史”领域已经被明确地开拓、确立起来了，但是所谓的思想史研究领域还没有被明确地确立下来。因此，我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为出发点，把研究对象限定在近现代中国，一边借鉴“东

洋史”、“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等领域的既有成果一边推进自己的研究。

1956年3月我结束了特别进修生前期的课程，进入了后期课程。前期结束时，丸山老师读了我的论文，他说：“这不是我的专业领域，还是让竹内好先生帮你看看比较好，我把论文交给他吧。”于是，我们一起去了竹内先生的家，他家住就在丸山老师家附近。跟两位大家同处一室，使我非常的紧张。竹内先生对我的文章只评价了两三句，我感觉大概意思是“作为3年内写出的东西还算脉络清晰”（笑）。除此之外，我就只是一直在旁边饶有兴味地听两位先生的闲谈。从知识环境来看，能在两位先生的身边从事研究真是幸事。那次见面是我和竹内先生的初次见面。现在想来，丸山老师大概是想让竹内先生带着我一起研究才介绍我们认识的。

到了特别进修生的后期，我感觉到知识的外延一下子扩展开了。但是，虽然受到了丸山先生和竹内先生的影响，我却不得不思考“如何进行自己独自的研究”。他们两位先生各自都有着非比寻常的磁力，所以自己不格外努力的话就只能被牵着走了（笑）。

村田雄二郎：

那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已经成立了么？

野村浩一：

很早就成立了。那时，最先邀请我参加的是孙文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由岩波书店为了编辑《思想》杂志的孙文特集而组织的，成员有竹内先生、野原四郎先生、安藤彦太郎先生（早稻田大学）、野泽丰先生（教育大学）、新岛淳良先生等。我还在《思想》1957年6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孙文的民族主义和大陆浪人》的论文。由竹内先生引荐，我通过工作渐渐与大家熟识起来。

此外，还有一件事必须加上，那就是我还参加了一个民间的研究所——中国研究所组织的研究会。中研（“中国研究所”的日语简称，下同）明显地在招募战前的左翼人士，虽然我本人跟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瓜葛，但我并没有对接触中研产生任何抵抗情绪。我觉得自己的基础知识还十分贫乏，所以想从任何地方吸收知识。我在中研认识了幼方直吉先生，幼方先生曾带我去过仓石武四郎先生的家。当时中研的所长是平野义太郎先生，有一段时间我还参加过中研的成员竹内实先生的研究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接触的人十分广泛，这也无疑是战后短时期内的一大特点吧。但是，现在想想，我当时无论走到哪儿都像一个“游击队员”一样啊（笑）。从这点来看，我原来在政治学会，但现在在现代中国学会和中国社会文化学会也是同一个道理吧。

另外，在研究和教育方面还必须提及的一件事是，1959年我在立教大学新增的法学部里担任了东洋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副教授。当时，法学部并没有设置这门课程，就是说，法学部里大概还没有与中国问题直接相关的课。那时，我们还没有和中國大陸恢复邦交，在一直有着东洋政治思想史教学传统的文学系、东洋史系、中国哲学系还好一点，可是在法学部怎么进行授课着实让人头疼。而且，学生们对这样的课也不太感兴趣。但是现在，任何一所大学

的法学部都开设了国际关系论和地域研究，这些主要是关于近现代中国论的课程。在回顾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历史时，这些都足以成为一个论点吧。

村田雄二郎：

在您刚开始以近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时，您的老师丸山先生于 1956 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高度评价赞扬了陆定一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另外，中研的研究也站在“新中国”一边。您能介绍一下当时对于中国的研究环境和研究状况吗？

野村浩一：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讲，当时对中国的认识是很普通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者的中国”。但是，在理性世界中我仍然有一种较强的所谓“进步知识分子”的意识，我觉得经过“斯大林批判”问题中国已经走上了独自的发展道路。具体说就是“毛泽东中国”的独特性或者“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但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逐渐演变成了“反右派斗争”。我觉得“反右派斗争”作为历史决定性的转折点，它的重要性当时并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其中一个现实原因就是信息不足，后面我还会再次提及这个问题。另一发面是因为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论”等观点给各种各样的解释提供了余地。

我从 53 年到 58 年攻读特别进修生，53 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55 年召开万隆会议，57 年从“鸣放运动”到反右派斗争，58 年大跃进，这些确实都对我产生了影响。但实际上，对这些我只是一瞥而过，我当时的想法是应该首先研究历史。对这些事实，至少到大跃进为止，我都采取了特别对待的态度。那时，我身边几乎没有认识的中国人，我抱着“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这一疑问，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在摸索。在当时，人们普遍抱有“中国虽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但与苏联还是有区别的”这样一种想法，我本人也有想重点探求“中国独有的思想”的打算。

对我来说，对这一问题的探求逐渐明朗化是在 60 年代。我 64 年写的《中国民主主义的诸问题》（《讲座·现代》第 12 卷、“竞争的共存和民主主义”，岩波书店、1964 年）这一论文正是倾注我心血的答案。这也是由政治学研究者参加的研究会上得到的成果之一。在文章中我引用了爱德华·斯诺的著作，并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实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的做法进行了评价，这是一个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心里还存有一些怀疑和疑问。这仍然是因为我从近代政治学的起点出发对我的研究造成了影响。用一句话说，我的问题是毛泽东提出的“团结——批判——团结”的公式，如果从政治社会的存在方向这一侧面来看，这个公式必须改为“批判——团结——批判”。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脑海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市民社会的观念。

村田雄二郎：

您在《思想》1962 年 3 月号上发表了《“五四革命”的思想——关于李大钊》一文（此后被《中国革命的思想》一书收录），之后又在《思想》1964 年 12 月号上发表了《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上）——关于其形成过程的考察》。我感觉 60 年代您对毛泽东的关心逐渐增强，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 中国革命的独立性以及作为革命先驱的李大钊和毛泽东身上，您觉得我这种理解是否正确呢？

野村浩一：

基本可以按这样理解。但实际上，对这些研究我起步有点儿早了。我原打算按着康有为、梁启超、《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论争、孙文这条线学习，之后再慢慢的好好的研究。我还没有充分了解辛亥革命就把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作为了研究课题，接着就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问题进行了极其粗浅的研究。现在想来，还是受到了时代需要的冲击啊。60 年代以后，从大跃进的失败、进入所谓调整期、中苏论争的开始等，发生了一系列让人难以理解的变革，我们必须知其本体，必须探寻变革的秘密。另外还有一点，当时两国尚未恢复邦交正常，所以我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实情。这在考虑当时情况时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此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上特别进修生后期时，大家都在阅读《读书报》、《图书报》、《读书人》等周刊书评性的报纸，那时开始我就经常接受别人的委托写书评。我为郭沫若的《抗日战争回想录》、犬养健的《长江依旧流淌》、竹内先生的著作等都写过书评，现在想想真是觉得冷汗直流。可以说在当时的政治状况、思想状况中，人们对中国问题有着强烈的关注。另外，通过丸山先生的推荐，我还针对三铃书房的《北一辉著作集》第二卷《支那革命外史》写了一篇非常粗浅的“解读”。通过这篇文章，我接触了北一辉的理论，并受到其影响。从那以后，我产生了研究包括北一辉和吉野作造在内的日中关系问题的想法。

有一次，我对竹内先生表示“我想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作出独特的见解，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日中关系史”的想法，他明确的回答我说：“这种想法不可取，应该进行平行研究。”这对我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建议，我认为它与日本人应该以什么样的视点研究近代中国是紧密相关的。

村田雄二郎：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是以竹内先生还是以西顺藏先生为核心呢？

野村浩一：

我觉得是竹内先生。

与这个问题有关，得把话题转回前面的内容。与前面提到过的在特别进修生后期接触的研究者增多有关，我曾经加入过历史学研究会并担任过委员，并且有幸结识了西顺藏先生（一桥大学）。西顺藏先生的读书会里有新岛先生、高田淳先生（学习院大学）、近藤邦康先生（北大到东大）、伊东昭雄先生（横滨市立大学）等人。顺便说一下，经高田先生的介绍，我在东京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室做过一次关于康有为的报告，研究康有为的大家宇田哲人先生也出席了报告会，真是惊得我一身冷汗（笑）。另外，由于高田先生的引荐，有一段时间我还参加了鲁迅研究会的分会（读《天演论》讨论会）。在西顺藏先生的读书会上，我还读了章炳麟和

谭嗣同的文章，学习了关于章炳麟的无政府主义和佛教等各种内容。西顺藏先生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也许这是我个人的特殊情况，但我觉得一般来说研究环境都是流动的、开放的。

另外，我听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是用竹内先生和野原先生所著的岩波新书（《中国革命的思想》）的版税创办的，在本乡（旧区名，东京大学在此地）的学士会馆分馆集会，并发行会报（从 59 年开始）。我觉得竹内先生有相当明确的意图想稳步推进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他想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场所，正因为如此，竹内先生比较致力于促进研究。西顺藏先生也经常出席研究会，我记得还请来了山田宗睦先生（日本思想史）。此外，丸山松幸先生（东京大学）在事务性工作等各方面倾注了很多精力，同时，研究会中也出现了若干名核心成员。

此外，我与市古先生、坂野学长、卫藤学长、还有山本达郎先生（东京大学·东洋史）、石川忠雄先生（庆应大学）等人的进一步接触，是与美国的中国研究有关系的。这些先生组织了东洋文库的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美国的福特财团出资赞助的，后来成了反对接受资金运动的批判对象。或者反过来说，也许是为了取得资金才成立的委员会也不得可知。我因为属于同一个“学问系统”（？）被该委员会邀请，也参加了一些研究活动。

在最初阶段，我一直追随着美国的中国研究。例如，我写了 Msrius B.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1954 的书评（《史学杂志》第 66 篇第 1 号、1957 年 1 月）、Levenson, Joseph R.,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 1958 的书评（《史学杂志》第 68 篇第 1 号、1959 年 1 月）、还有周策纵先生的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的书评、以及关于费正清（原名约翰·金·费尔班克）先生的工作的介绍。虽然不能说充分消化了其内容，现在想来，在某种意义上我明确了自己所处的位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美国的研究是一种广义上的、社会科学上的研究，我自身也感觉到了这种研究的必要性，而且在东洋史研究的领域几乎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介绍。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范文澜先生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被介绍到了日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印象。这本书在东洋史关系上拥有很强的影响力，用单一标准来看也有很多我赞同的地方。但是，我内心依然渴望尽可能多方面地进行研究的欲求。

村田雄二郎：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会是反对亚洲·福特财团运动的先锋吧？

野村浩一：

是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加入了东洋文库的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所以对这个运动既不持反对立场也没有完全赞成的意思。我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在东大的大教室召开了关于福特财团问题的讨论大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全部学者参与的关于亚洲·福特财团问题的研讨会），竹内先生和西顺藏先生都参加了会议。我拿出了些许勇气，在大会上作出了“一味的反对是很可笑的”这一发言。我认为这是一个关乎独立性的问题。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一发言被思想史研究会的各位先生排斥。我认为从这一点看，言论还是十分开放和自由的。

此后，市古先生和坂野学长远赴美国，各自发表了“乡绅革命”论和 *China and West, 19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 1964。但是，从全局看，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东洋史学完全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流的，其中也包括历史学研究会的研究在内。西岛定生先生（东京大学）等从战后早期开始就宣扬遵循贯彻“世界史的基本法则”这一方针，并积极参与了时期划分论争、致力于推进研究。在近世、近代领域里，田中正俊先生（东京大学）进行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并发表了文章。但是，在同一时期也产生了新的动向——即消化吸收费正清以后的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石川先生翻译的施瓦茨的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一文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村田雄二郎：

包含社会方法的地域研究性质的中国研究是从美国开始的，在中研等的年轻一代人中，反对接受亚洲·福特财团投资运动的发起者们产生分歧的时期是在 1960 年左右吧？

野村浩一：

我个人的理解是，作为地域研究 *area studies* 的美国的对中国研究这种意识，在那个时候还不存在。实际上，地域研究这一说法被用于意识领域是在那以后的事。当时正处于冷战之中，与中国对立的美国向日本提供了数额庞大的资金，试图影响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因为曾经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战争，所以日本和大陆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作为日本研究者，不能接受这笔资金这一思想上、政治上的立场，成为了反对投资运动的基本内容。与此同时，还存在着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方法论、研究的引进和吸收等问题。

村田雄二郎：

我记得坂野正高先生邀请玛丽·赖特（*Wright, Mary Clabaugh*）访问东京是在 60 年代，在这之前没有过与美国学者的直接接触吗？

野村浩一：

有过。

村田雄二郎：

是与赖世和先生（*Reischauer*）、费正清先生同一体系的哈佛大学学派吗？

野村浩一：

我曾经与费正清先生、詹森（*Jansen*）先生、施瓦茨先生有过一面之缘。但只是见过面而已，我当时初出茅庐，所以还达不到能与他们同堂讨论问题的程度。列文森先生（*Levenson*）来日本时，我和他约好见面了，可是当时情况有变所以没能见上。可能话题稍微有点跳跃，不久后的文革时期，我还曾经和爱德华·斯诺先生在《朝日杂志》中对过话（笑）。那是 66、

67 年左右，在我的印象中，处在当时无法进入中国的时期，斯诺先生本人也不清楚文革中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另外，当时东洋文库的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和之后的庆应大学的中国学在研究氛围上非常相似，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村田雄二郎：

我感觉您在 1966、67 年左右才开始真正发表毛泽东论。例如，67 年您和竹内好先生共同编辑发行了《讲座·中国 I 革命和传统》（筑摩书房），正好和文革的开始处在同一时期。您能谈谈这个时期的事情吗？

野村浩一：

65 年美国军队轰炸了越南北部，66 年春季文革开始、夏季红卫兵运动兴起，67 年 1 月以上海为第一枪各地陆续开展夺权斗争，8 月发生武汉事件，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骚动。整个日本都非常关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骚乱，筑摩书房作为发起者，以竹内先生为中心的京都的各位研究者共同协力写成了一套讲座集。堀田善卫等人也参与了编辑工作。讲座共 5 卷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前几次的类似碰面会的会谈中，加藤周一先生和武田泰淳先生也参加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讲座集并没有完全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定位。在 67 年前后，对当时的形势我个人也并不十分了解。我们完全不知道文革是因何而发生的，当时这确实让人挠头。那时已经进行了 10 年左右的对中国研究，可是仍然对文革因何而起毫无头绪。那个夏天真是过的非常痛苦。最终，我只好搁置疑问，做起了“俄罗斯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对比。现在想来，竹内先生和其他各位研究者在当时也都没有真正领会到其中的原因。竹内先生本人是十分慎重的，他试图把问题先放在中国的历史和风俗中，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并没有显现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一直到 72 年日中恢复邦交为止，研究的信息都非常缺乏。保守地说，对于中国公开发表的言论，必须首先以思想为基础进行考查。当时，还有一种从香港传来的所谓的“观望中国”的方法。但是，我认为作为一名研究者来说，不能只依赖信息进行考查。翌年，我写了一篇《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特质——关于群众路线思想》（《思想》1968 年 3 月号）的论文，着重讨论了干部和群众的形式、所谓的群众路线存在的问题、毛泽东运动的表现方式。实际上在当时，我觉得可以用思想的内在方式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或文革的某一侧面。群众路线这一问题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党动员并领导人民大众。此后的研究也非常明确的表示出，不能用价值观来评价其实际情况。我至今仍认为我对中国革命思想的理解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之后关于党的问题的分析也存在着明显的认识上的错误。第二年，我在《现代中国的党派和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相关联》一文中，将党的概念规定为“核心党”，试图找出其特殊性质这一做法是不正确的。这是过分受到中共九中全会（1969 年）影响的结果。

再稍微往前回顾一下，在文革前夕，64 年中国的核试验也确实给了我们很大冲击。那时，由竹内先生发起成立了满洲问题研究会，参加者为数甚少，但平野健一郎先生参加了。在研

究会中，由竹内先生征求大家的意见，并组织讨论。但是，由于我们能力不足，这个研究会不久就解散了。

村田雄二郎：

在您 70 年代的研究中，有很多关于大陆问题和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的著述，比方说您做过关于桔樸、尾崎秀实等人的研究。这些是不是“满洲问题研究会”的延伸呢？

野村浩一：

这些和“满洲问题研究会”完全是两回事。

村田雄二郎：

那么，在您的意识里，这些问题与关于毛泽东及文革的研究各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之间有无联系呢？

野村浩一：

在 70 年代的上半期，文革中的中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是一片混乱，所以当时我不太倾向于对中国的现状进行分析。但是用政治学的观点看，我却不得不思考这些最后要如何收场的问题。像我刚才提过的一样，竹内先生曾经建议我在研究日中关系史时“应该平行研究”日本和中国两方面的问题，我认为此话确实很有道理，所以有人拜托我做此方面的研究时我比较积极。可以说其背后也存在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必须在自己所处的现代中国研究的领域，广泛地学习战前的或者日本近代的中国研究、以及前人的研究。我觉得桔樸是处在当时中国和日本的交叉点上、在很小的范围内一直持续研究的一个人物，是值得我选取及考察的对象。

村田雄二郎：

71 年时曾经出版了一本《中国革命的思想》（岩波书店）。我觉得即使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先驱性的研究，特别是追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成过程的部分。我觉得文革时期能出现如此著作，真可谓是值得全世界赞叹的研究成果。在您的观念中，或者在日本的研究界中，对文革看法的转变是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呢？

野村浩一：

是从林彪事件开始的。我在 71 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正是这一年发生了林彪事件（消息于 72 年公布）。此前，在九中全会（1969 年）上制定的党章中正式写入林彪为下一届国家主席继承人时，我非常地不理解，这种政治方式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在文革的时候，我思考过要想从内在了解中国应该如何去做，并试图从思想上提取出其内在的部分。但是，林彪事件以后，当时的所有问题都与政治挂上了钩，从某种程度来说，只要能接触到略微有用信息，

就可以了解到政治的走向。所以，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对从思想上分析问题的方法失去了兴趣。

村田雄二郎：

中国恢复国际地位正和林彪事件发生的时期相重合，在您看来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中国呢？您是否理解为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呢？

野村浩一：

72年的尼克松访华对日中邦交的恢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我看来，与其分析国际关系或中国自身的变化，倒不如先把它当作日本人自身的问题来理解。用一句话表达，恢复邦交正常化可谓“云开见日”。可以说此前我们和中国大陆一直处在“战争状态”。实际上，从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欧美国家的学者都陆续去过自己研究的国家了，而研究中国的学者却无法踏上中国这片土地，这一直是我们心中的遗憾啊（笑）。稍微夸张地说，我多少有这样一种想法，这是背负着侵略战争历史的日本的中国研究者的“原罪”（!）。在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如果有留学的机会想先去美国留学，但是后来美国挑起了越南战争，我就打消了去美国的念头，转而把留学目的地定为了英国。已经开始做赴英留学的准备时，我突然患上了哮喘病，最终英国留学未能成行。

村田雄二郎：

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后，您与中国进行了怎么样的交往呢？

野村浩一：

恢复邦交以后并没有马上与中国进行日常交流，7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才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吧。当时，正好赶上一个访华旅行的机会，我就去了中国。到中国后，我提出想以学术交流为目的来中国留学，对方特意来到我住的北京饭店，以宿舍等设施还不健全为由回绝了我。当时，虽然交流渐渐有了进展，但仍然是一种发散式的交流，我们对中国的情况还不是十分了解。真正的全面交流应该是从80年代开始的吧。

村田雄二郎：

您能讲讲85年您在上海逗留一年期间的体会吗？

野村浩一：

70年代访华时中国还处于“城中不见街市”的状态中。71年第一次访华时，我看见自己一直研究的国家竟然是这种样子，心里真是无限感慨、茫然若失。当时，我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此后，81年时我到哈佛大学留学，受到了傅高义先生（vogel）、施瓦茨先生和孔飞力先生（Philip A.Kuhn）的多方关照。85年时，由于特别想知道中国的市民生活的实态，

我便去了上海。但是，我感觉自己仍然没有自由地融入人群之中。

村田雄二郎：

当时中国是处在胡耀邦时代吧，政治上来看日中关系还是不错的。当时，以改革开放作为催化剂，中国掀开了“面纱”。通过和 80 年代后的中国、以及通过和中国人的交流，您对自己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研究有何新的认识吗？

野村浩一：

村田先生您当时也正在中国留学吧？

村田雄二郎：

我从 82 年夏天到 84 年夏天在北京留学了两年，跟您留学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当时正是靖国神社和历史认识问题刚开始出现的时期。

野村浩一：

社会的思想管制还相当严重（笑）。

村田雄二郎：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机制还在发挥作用吧。

野村浩一：

去商店还是什么也“没有”的时代（笑）。我感觉那时还算不上是开放体制啊。不但积欠外债，国内物资也不充足。但是在当时，我们必须思考如何用世界史的眼光看待这一时期的中国。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起飞”阶段，以喷气式飞机作比喻，过“大”而且过“重”的中国，能否从跑道上腾空而起呢？或者说，会不会在滑行途中变得七零八落呢？

村田雄二郎：

我明白您的意思。我 20 岁左右去中国留学，首先体会到的是社会主义体系下的物资不足和生活不便。另一个体会是，就像昭和 30 年代日本高度经济成长时期一样，中国人民整体都有一种“国门一开东风来”的乐观情绪。胡耀邦的 84 到 86 年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到了赵紫阳时代，发生了通货膨胀、经济紧缩等问题，再一次体现了党的“控制能力”。那么，您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怎么看的呢？

野村浩一：

对于当时的中国必须分为两个历史框架来看。一方面是在战后历史中，日本从废墟中崛起，经济开始复兴、成长。当中国力图进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代时，应该在上述 20 世纪

后半的历史背景中来看待中国当时的地位。当时中国人民自身可能也对这个问题极为关心，还邀请了很多日本的经济专家远赴中国，讨论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是 19 世纪日本对外开放到近代化的过程这一历史框架。众所周知，当时中国的留学生当中，有很多人以日中近代化的比较为研究课题。我觉得，必须从短期框架和长期框架这两种视角观察问题，再把焦点统一起来。但是，关于这个时期到底如何进行评价，当时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想法。另外，因为与政治学研究有过联系，在“六·四”的前一年即 88 年，我和福田欢一先生（东京大学）等人一起访问了中国，会见了严家其先生和逢先知先生并一起探讨了汗很多问题。当时，我感到中国的政治改革正在提上了日程，而且强烈地感觉到形势的严峻。但是，“六·四”的发生仍然在我的意料之外。当时各种各样的信息、影像铺天盖地而来，对事件情况进行实时报导，事态完全是在新闻媒体领域进行的，我们只能关注报导。但是，围绕最广义的民主化问题考虑的话，事件的本身还是很单纯的。从研究方面来讲，稍前开始的《岩波讲座·现代中国》研究会和该书发行的时期，正好是“六·四”发生的时期，所以，出版社又紧急增补了 2 卷。整个讲座集非常畅销，被大家广泛阅读。

另外，提到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交流，我曾经邀请上海的主攻思想史的汤志钧先生到立教大学讲学，为期一个月左右。此外，我还在北京结识了李泽厚先生、丁守和先生等人。可以说渐渐地展开了个人的交流。

村田雄二郎：

在《岩波讲座·现代中国》（增补卷 1《民主化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中，您写的《中国的权利和传统》是一篇在“六·四”的冲击之下、跨越各历史时期省察中国的权力构造的文章。就我理解，这篇文章是和此后的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的重新考察有一定关联的，不知这种理解是否正确呢？

野村浩一：

脱离对“六·四”的实态分析来说确实可以这样理解。我以为我以经相当深地挖掘了中国革命这一课题，但通过文革的过程使我了解到，实际上我的挖掘方式还很肤浅。在文革的过程中，给我最大冲击的是出身血统主义。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文革中忽然跳出这种主张，真是让我无法置信。还有一点就是暴力的出现和无政府状态。用另一种方式说，文革是某种强烈的理念性呼吁的爆发。也就是说，文革具有的理念性和暴力性在这一时期非常强烈地显露出来，并且，这两者是合为一体的。把这两者连接起来的正是毛泽东手中的权力。我认为以上的两点，在探讨中国革命以及经过文革洗礼的中国时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深究的话，可以说这是“权力或者权力的使用方式的问题”，具体说就是皇帝的权力或者皇帝模式。我感觉，虽然中国从上到下有各种不同阶层的人，但是仍然还是由当权者即那些握有实权者掌握了全部指挥权，真是可以呼风唤雨啊。我听说中国有一种说法叫“权力不用、过期作废”。也就是说，拥有权力的期间必须不遗余力地使用。所以，我非常想探求滋生这种权力意识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对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的研究（《近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岩

波书店、1990 年)、对辛亥革命的政治文化分析等,可以说大致是在这种探求思想的延长线上的。

村田雄二郎:

包括日本人在内,外国人在研究中国时,或者关注中国特有的权力构造、特殊的政治文化,或者以政治学等的诠释方法进行横向比较及展望,我觉得对中国的研究似乎一直是围绕着这两极问题展开的。包括汉学和支那学的研究在内,地域研究者们一直以来以阐明中国的固有性和特殊性为目标。但是,在全球化的现今时代,我们直接面对的是中国研究本身有何意义这一古老而又全新的问题。我觉得,对于中国政治中的某些从外部很难看到的部分,一方面在普遍的框架内考查的同时,另一方面应该赋予其一致的·内在的理解,这两种视点都是必要的。您可以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看法吗?特别是您如何看待南巡讲话(1992年)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呢?

野村浩一:

对于您的问题我很难直接作答。我在 94 年写的《辛亥革命的政治文化——民权·立宪·皇权》(上)(中)(下)(《思想》1994 年 7 月、9 月、10 月)中,选取了这个时期,对中国内在的各种思想、文化的存在方式及其动态、对近代的概念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我感到在分析中国的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这一历史时期时,必须从中国历史这一纵轴、和世界史即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系统这一横轴这两方面来看,所以我采用了政治思想史的分析方法。

此后,在 95 年写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岩波书店)中,我对蒋介石政权进行了思考,这使我非常感兴趣。我觉得在这本书中,我多少做到了将清末到民国的各时期连成一线看待。我认为,蒋介石的权力是一种“恩顾主义”的权力,他的权力仍然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并迅速向家族长的权力发展。有这样一种说法,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蒋介石也许不会败给毛泽东,我对这种看法持否定态度。要使世纪初叶及 20 年代的中国政治和社会构造发生基本的改变是非常之难的。而且,日本的侵略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东亚近代史中不可忽略的本质部分,所以历史上几乎是不存在假设的。

在我最近写的《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地位和命运——以 30 年代胡适著<独立评论>为中心》(上)(中)(下)(《思想》2006 年 7 月、9 月、10 月号)一文中,我将胡适作为了分析对象,但是我仍然对胡适主张的自由主义是否被普遍接受存有疑问。对权力必须要批判地对待,这是胡适一贯的主张,这也是今后必不可少的课题,是十分有历史意义的。但是,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国有的核心思想即使在与外来事物发生冲突时发生了改变,它仍然可以显示出其固有的活力。包括对胡适的观点在内,我认为通过这类与过去的对话,自由主义要素今后还将存在于中国内部。

现在回到您刚才提的问题上,我同意您说的必须从两方面考虑问题的观点。而且,这在研究近代以后的中国时是绝对必要的。从历史哲学的观点来看,对于“近代”的定义本身就是个大问题,如果不平行考虑历史横轴的问题我们就无法真正认识 19 世纪以后的中国。南巡

讲话以后，中国刚刚迈向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时代，但 90 年代末以后，中国在转眼之间就被全球化的浪潮吞噬了。中国在这股浪潮下的迅速发展是日本几乎没有预期到的。可能中国会把这股浪潮吸收到自己内部加以利用，也可能中国现在仍然像走在悬崖边上一样。

村田雄二郎：

在中国至今为止变化最小的部分就是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有一种意见认为，基层阶段的的选举是民主化的第一步，但是我觉得始终看不到中国内部存在民主主义。另一方面，近年来权力的腐败化日益加剧。将这些问题跟您的研究连接起来考虑的话，您有什么看法呢？

野村浩一：

我觉得，首先必须推进权力的透明化和公开化原则。30 年代的胡适感叹于他所在的城市——青岛终于可以进行选举了。可以说无论处在哪个时代，人们都能感到意识领域的进步吧。批判原理的重要性是与市民社会论相关的。在分析现状时，这种方法是极其重要的。现阶段，展开包括 NGO、NPO 在内的“市民政治论”这一课题是十分必要的。

村田雄二郎：

您对今后的中国研究有何期望呢？另外，在日中关系或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方面，您对后继的研究者们有什么建议吗？

野村浩一：

这个大问题的真是十分难以回答。如果谈谈我的一点儿感想的话，在 90 年代以后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上，其研究环境明显改善，真是不能与以往同日而语。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资料的公开、史料的挖掘、以及这两者共同促进下的研究的进深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历史固有的领域里，我们必须与包括中国研究者或欧美等地的研究者在内的、全世界的广大研究者比肩并行，在同一块土地上推进研究工作。也就是说，必须在广义的汉学、中国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因此需要具备一定的研究实力。这也可以称为“学问”的普遍规律吧。但是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对中国的研究说到底还是一种外国研究。我们必须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研究我们亲眼所见的中国实情，而且必须对中国事物作出客观的评价。实际上，如果单从研究资料方面看的话，最终我们肯定会有很多地方无法超越中国的研究者们，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正因为如此，即便我们受到身为日本人的约束，我们也必须要以自己的立场来进行研究，我认为这对日本、同时对中国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当然，这么说可能只是一种豪言壮语，实际上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基础性工作做起，必须要经过逐渐积累的过程。对这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但豪言壮语也是不得不发的。

除此之外，无论如何也必须提及的是，今天的话题中没有涉及到的、十分重要的台湾问题。我从来没有去过台湾。70 年代之前虽然存在某些政治上的问题，但我自己并没有刻意回避去台湾。虽然受到过台湾方面的多次邀请，但机会总是失之交臂，等到我的时间完全可以

自由支配以后，我的身体状况又不允许远行了（笑）。提起战后的台湾，我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和戴国焯先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年轻的时候是中国的革命派，我觉得他的观点是，台湾的“解放”才代表中国革命的完结。所以，在当时，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十分的紧张而且微妙。另外，在同一时期，我也从王育德先生的著书里面了解了台湾独立派的一些主张。

村田雄二郎：

80年代末期以后，在台湾本地也兴起了台湾研究的新趋势。以前，竹内好先生曾经对中国研究者将台湾研究摒弃在研究视野之外的做法进行过批判。但是，今天听了您的一席话，我觉得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日本的中国近现代研究未必是要把台湾排除在外，而是在特定时代的影响下不得以而为之的一种做法吧。那么，60、70年代时，台湾的存在在中国研究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呢？

野村浩一：

我自身是从解析“新中国”这一基本点出发进行研究的，所以我只把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来考虑。在这一点上，前半的研究受到了戴国焯先生的极大影响。在蒋介石作为总统进行统治的时期里，可以说国、共这一政治图示一直掩盖着台湾问题本身。但是，从那时开始，戴先生一直在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正如大家所知，他返回了台湾并活跃于各个场合。另一方面，尾崎秀树先生——因“间谍事件”被判死刑的尾崎秀实先生的弟弟——的学生时代是在台湾度过的，在战争中，他从自己的实际体验出发，选取了日本殖民地文学中的台湾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与竹内先生有着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脱离台湾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从很早的时期开始，我就通过“中国会”等活动得到了他的很多指导，第一次访华也是与他同行的。我认为，一直到70年代为止，中国研究和台湾研究确实都受到了政治的极大影响。

村田雄二郎：

最后，在方法论方面，您对中国的近现代研究有何期望吗？

野村浩一：

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我觉得应该用普遍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中国本身也处于世界史的洪流之中，所以应该以敏锐的反应力来推进对中国的研究。像刚才叙述过的一样，从我的感受来说，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在9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进入21世纪这一时期内，转眼之间就被全球化的浪潮吞噬了——在所有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可以说中国在“近代·现代”这两个课题中探索前路、蹒跚挣扎。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其固有的东西，通过这种东西的不断变化，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时代。因此，只能把这种关系说成是纵轴与横轴、是两者的交点或交接面吧。我认为，在中国不会有“另一个近代”。虽然价值领域的普遍性已经渐渐为人们所共有，但是在行动上和态度上，

传统性的东西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并发展着。总之，我认为有必要以这样的视角来解析中国的近现代。

村田雄二郎：

今天，您给我们讲了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十分感谢您。